

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研究

尉利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研究

尉利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研究 / 尉利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161 - 2586 - 1

I. ①朱… II. ①尉… III. ①朱熹(1130—1200)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244. 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715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在中国悠久的儒学传统中，朱熹的学说可谓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他的理学不仅站在了他那个时代的理论巅峰，推动了儒学的发展，被后人誉为“新儒学”，而且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研究朱熹理论的著述已然汗牛充栋，难以计数。我们现在再谈论朱熹思想，究竟有何理论或实践上的价值呢？

20 世纪 80 年代初，学界开始引入西方诠释学，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以此反观中国的思维与文化传统，重新审视中国的典籍，渐而成为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模式。正如在这种中、西学术思想的相互激荡中，催生了文学诠释学、法学诠释学、哲学诠释学、宗教诠释学、历史诠释学等诸多诠释学的延伸研究领域，诠释学也演变成了一种普遍有效的解释工具。本书作者尉利工博士的研究工作就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中展开的。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诠释学，长期浸淫于西学，有所心得。俗云“叶落归根”，此言不虚。近年来，我常常责备自己流连于西学而不知归返，不免有数典忘祖之嫌。因心存此念，我便开始关注中国的诠释传统，并希望能借鉴西方诠释学成熟的理论体系来完善甚或构建立足于中国文化与思维传统的诠释学。中国有两千多年诠释儒家经典的历史，这为创建中国古典诠释学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对儒家经典文本的诠释，大致说来有两种进路，一是章句训诂之学，即对经典（文本）进行文字上的分析与理解；二是义理之学，即对文本进行整体的义理把握，这也就是清儒所谓的汉学与宋学。朱子是宋学的集大成者，但他不拘泥于此，而是兼取汉、宋，融合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其经典诠释思想达到

了当时中国经学发展的新的高度。朱子作为维护儒学正统学说的思想家，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对儒家经典作深入研究，既训诂考据，探讨经典之本意，又发明义理，探索圣人作经之寓意，并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与发挥，从而建立起以天理论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同时又以天理为标准来诠释儒家经典。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经典诠释的依据和标准，并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提出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和经典释读法，在这个过程中，朱子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思想。我认为，他的诠释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 600 年后的现代西方诠释学的奠基人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诠释学（参见潘德荣《阅读与理解：朱子与施莱尔马赫诠释思想之比较》，载《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黄俊杰主编，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4 年版）。当然，我们毋庸讳言，朱熹的诠释思想虽然丰富，但均散见于丰饶的著述之中，因缺少一种体系性的建构而不能称其为现代意义上的“诠释学”学科。但是，朱熹虽未构造出一个系统的诠释学的理论体系，而更侧重于理解与解释的实践，然而他对诠释问题的思考无疑丰富且又深刻的。正如在本书所展开的研究中所揭示的，他的诠释理论已相当深入地探讨了现代诠释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即使从现代诠释学的角度来看也依然是很有价值，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朱熹的诠释理论的主要原因。

经过近 30 年的推广与研究，现在学界也频频提到“中国的诠释学”，不过在我看来，当我们提到这一术语时，并非意指某种已有的、现成的东西，毋宁说，是指需要经过我们对中国诠释传统的反思而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且又繁复的任务，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我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学子投入这项研究之中。2004 年秋，尉利工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攻读中西比较哲学研究方向博士学位。作为利工的导师，我建议他首先初步了解西方的诠释学，并运用诠释学的有关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朱子的经典诠释思想，按这一研究方向撰写博士论文。对利工而言，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因为这项研究需要横跨中、西诠释理论的两个理论领域。令人欣慰的是，历经三年的系统学习与勤奋写作，他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摆

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在听取了答辩组专家的意见基础上修改而成。现在该书要正式出版，利工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同意，很高兴能为这本迄今为止较为全面地运用诠释学的方法研究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的力作奉上我的序言。

潘德荣

2011 年秋于上海寓所

目 录

序言	(1)
绪论	(1)
第一章 朱子经典诠释学的兴起	(11)
第一节 朱子学产生的背景	(11)
一 佛道二教对于儒学传统的挑战与儒学的回应	(11)
二 北宋新儒学、理学与宋学	(18)
第二节 汉学与宋学对经典诠释之异同	(26)
一 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	(26)
二 宋学对经典义理的发挥	(29)
第三节 朱子经学基础的奠定	(33)
一 早年杂学	(33)
二 由驰心空妙之域接续伊洛渊源	(39)
第二章 经典诠释路径与文本重心的转换	(43)
第一节 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	(43)
一 天理论	(43)
二 理一分殊	(48)
第二节 返本开新——经典诠释路径的转变	(50)
第三节 朱子的“四书”学——文本重心的转换	(55)
一 “四书”的集结	(55)

二 《四书章句集注》	(66)
第三章 朱子训诂与义理并重的经典诠释原则	(70)
第一节 朱子的训诂学	(70)
一 信古阙疑	(73)
二 训诂考据要以义理为标准	(75)
三 于讽诵中见义理——对有声语言的重视	(78)
第二节 对经典的义理阐发	(81)
一 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与《圣经》的四重意义	(82)
二 重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	(84)
第三节 朱子的经典释读法	(88)
一 熟读而精思	(89)
二 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	(91)
三 读书须是虚心切己，不可先立己见	(92)
第四章 朱子的经典诠释方法论	(96)
第一节 唯本文本意是求——语言诠释	(97)
一 随文解义	(99)
二 不以己意解经	(106)
第二节 穷理为先而力行终之——体验诠释	(111)
一 朱子的“人心同然”与施莱尔马赫的“心理移情” ...	(112)
二 朱子的切己体察与狄尔泰的体验诠释	(121)
第三节 格物穷理——即事诠释	(129)
一 理一分殊与道在日用间	(131)
二 格物致知，不离日用	(136)
第五章 朱子经典诠释的个案研究	(140)
第一节 朱子的《易》学诠释思想	(140)
一 《易》是以“形而上”说“形而下”	(142)
二 以象数求《易》之本指，据本指推说义理	(144)
三 《易》之经传相分的思想	(149)

第二节 朱子的《春秋》学诠释思想	(153)
一 看《春秋》如看史	(154)
二 以义理评《春秋》三传及诸家《春秋》解	(157)
三 《春秋》大义与言外之意	(161)
第三节 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	(165)
一 以义理解读《诗》之道德意义	(166)
二 否弃《诗序》、以《诗》说《诗》	(170)
第四节 朱子的《尚书》学诠释思想	(177)
一 考辨《尚书》真伪	(179)
二 “求圣人之心”——对作者原意的探求	(181)
三 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	(184)
第五节 朱子的《礼》学诠释思想	(186)
一 礼为天理之节文	(187)
二 《礼》应与时因革，不违义理之正	(191)
附录一 论《孟子》一书由子学到经学的地位变迁	(196)
附录二 论意、象、言的诠释学意蕴	(206)
附录三 汉宋经典诠释方法异同考	(217)
主要参考文献	(230)
后记	(237)

绪 论

—

朱子是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思想的最重要代表之一，朱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其丰厚的经典诠释思想为建立中国经典诠释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素材。钱穆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于南宋，不仅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也可谓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孔子与朱子矗立中道，皆能汇纳群流，归于一趋。此两人不仅为儒学传统之中心，亦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正反两方面所共同集向之中心，不仅治儒学者必先注意此两人，治其他百家众流之学，亦必须注意此二人。认为自有朱子以后，儒学才重获生机，发挥新精神。^① 钱穆把朱子与孔子相提并论，可见朱子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之高。

经学是儒学的主要形式，朱子经学是中国经学发展到宋代的理论代表。朱子作为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诠释的集大成者，其经典诠释的思想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朱子的经典诠释思想，对于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经典诠释学，和国际学术接轨，在同一理论平台上与西方对话，找到比较、沟通中西文化的学术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诠释学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艺术，已突破语言的界限，延伸到具有悠久经典解释传统的中国，并运用西方诠

^① 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页。

释学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宗教、艺术等。诠释学在西方有很长的发展历史，自施莱尔马赫奠定西方现代诠释学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经历过近代化转折，特别是哲学诠释学的根本改造之后，它作为当代最具活力的西方哲学思潮之一，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西方通常把诠释学定义为对诠释和解释的方法论原则的研究，尤其是对《圣经》诠释的普遍方法之研究，现在看来，这个定义的范围过于狭窄。事实上，现代诠释学已广泛地应用于各门学科，成为一种普遍的解释工具。

现在，以诠释学为参照背景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反思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正悄然展开。中国有两千年以上的诠释经典的历史，为创建中国古典诠释学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对儒家经典文本的诠释，大致说来有两大思路，一是章句训诂之学，即对经典文本进行文字上的分析；二是义理之学，即对文本进行整体的义理把握，这两大思路也即清儒所谓的汉学与宋学。朱子不仅集宋学之大成，而且兼取汉、宋，融合义理与训诂之学，其经学思想达到了当时中国经学发展的高峰。朱子通过注释儒家经典的形式，对中国经学乃至中国哲学加以思想理论的创造，把中国经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对后世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朱子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思想。

就经典解释而言，宋代处于一个儒学变革的时期，宋儒极力复兴过去时代的儒家文化传统，并使之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和佛学异端相抗衡，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对过去的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但对儒家来说，经典并非一般的文本，经典中蕴涵着古圣先王之道，而这种“道”，具有普适性，社会的纲纪制度，人的教化、礼仪及德性修养，一切都是由于经典的统摄规范。儒家经典的强烈的不可怀疑的有效性，是历代儒者诠释经典的一个理论预设，也是历代儒者孜孜以求追寻经典文本原意的根据。

历代儒者解经，都在尽力去追求圣人的原意。宋儒美化上古三代，崇尚古圣先王之道与先王典籍，其因则在于“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中庸章句·序》），希望在对经典的诠释中恢复古代圣王治天下的政治文化传统。经典的永恒意义与宋儒所处的异端横行的现实

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因而宋儒便不是简单地复兴过去时代的儒学文化传统,而是要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抛弃汉唐时代对经典的训诂注疏传统,以己意说经,把自己对当下政治现实的感受及个人的爱好兴趣直接介入到经典诠释的活动之中。

朱子作为宋学的集大成者,在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中,为建立具有时代气息的理本体论哲学体系作了充分论证。朱子通过诠释儒家经典,对儒家经典作深入研究,既训诂考据,探讨经典之本意,又发明义理,探索圣人作经之寓意,并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与发挥,从而建立起以天理论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体系。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经典诠释的依据和标准,并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提出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和经典释读法,在这些方面,同样也达到了中国古代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在宋以前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并没有系统的本体论思想,但道家、玄学和佛教,其对经典的诠释,却各有其本体论思想为基础。儒家经学对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经典著作的解释,停留在以训诂考释为主的阶段,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缺乏本体论的哲学依据,难以与建立在本体论哲学基础之上,并以之为依据的道、玄、佛思想相抗衡,以至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产生了理论危机与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在宋代表现的尤为明显。朱子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加以理论创新,提出系统完整的以天理论为主体的本体论哲学体系,从而大大丰富并发展了中国哲学。

天理论是朱子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理论,体现了其理学乃至宋学的根本特征,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朱子天理论哲学体系的构建,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而提出来的。朱子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注经的形式,其对经典的诠释,固然是其建立理本体论哲学体系的需要,并且经典诠释在朱子那里只是作为他建立哲学体系的手段,但他在对经典的诠释中所阐发的一系列思想,为我们现在建立中国古典诠释学提供了可资借鉴利用的素材,因此,对于学界正在致力建立的经典诠释学来说,对朱子的经典诠释思想的研究便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

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研究兴起的一个重要理论背景，是与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哲学”的自身个性及其特质的自我反思，尤其是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讨论密切关联。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探讨的是在西方哲学的语言背景下，中国哲学作为学科概念是否成立及其成立的根据是什么的问题。余敦康认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至今没有一种确实有效的方法，无论是胡适还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凸显了究竟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哲学之两难，似乎都是在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西方的理论，属于各种西方思潮在中国的翻版，而不是中国哲学思想本身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中，学术分类只有所谓经学、子学、史学等，并无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史、哲等学科分类。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以历史叙述的方式，将过去中国思想文化的演变分为上古的“子学”时代和中古的“经学”时代，其中经学和经学研究独居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的绝对主体和中心地位。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的建立，则迟至20世纪初。随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及与之相关的一套学术规范的引进，中国学者才开始用“哲学”或“哲学史”等概念来表述和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相关内容。这表明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其实是以西方哲学为依据和标准的，即用西方哲学的范式来诠释中国的思想文本。

以西方哲学作为哲学的标准，中国并无西方标准的哲学学科体系。现在说中国没有哲学，对于中国学界来说绝对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说法。我们认为，哲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范式，中国哲学自有自己内在自足的特质，这种中国哲学的特色，只有在对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中才能凸显。为了给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寻找稳固的理论根基，必须对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概念及其学科定位作出深刻反省，走出依傍西方哲学的阴影，这就要摆脱以前对中国哲学教条化、模式化的研究倾向，寻找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质与民族特性。由于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因此，对传统经学的研究和对中国固有的经学研究方法的切近体察，便成了对传统思想反思的焦点，这样，传统经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得到凸显，并在

新的理论语境下演化为经典诠释学研究的热潮，希望在对经典的诠释中找出中国哲学独特的性质与存在的理论依据。由此看来，对于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的研究，不仅是建立中国经典诠释学的需要，而且还具有超出经典诠释学研究本身的更为深刻的哲学和文化意蕴。

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仍有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原因就在于，我们本土的哲学研究一直依傍西方哲学，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而没有看到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的特质。现在对经典诠释学的研究也是这样，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如果我们以西方的诠释学作为诠释学的标准，我们也面临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合法性问题，即中国究竟有没有诠释学。以西方成熟的诠释学为标准，中国当然不存在作为学科的诠释学，但就像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梳理出中国哲学一样，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传统的对经典的诠释中梳理出中国诠释学。可以说没有经典诠释就没有中国哲学，哲学思想在经典诠释中展现出来，中国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经典诠释史。随着学界对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中国哲学的诠释空间和诠释维度，都将得到有效的扩展，同时也为新的中国哲学的研究提供丰厚的资源和独特的视角。因而经典诠释思想的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朱子的经典诠释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则是这一重要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三

研究朱子的经典诠释思想，需要在朱子庞杂的对经典的诠释中细绎出某种一般的方法原则。朱子一生著作等身，对经、史、子、集皆有涉猎，其经典诠释思想及方法蕴涵其中，要从中梳理出他的经典诠释思想，就必须抓住最能代表他的经典诠释思想的东西。朱子的诠释思想主要见于《四书章句集注》和《读书法》，另外还散见在《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通信以及其他著作中。研究朱子的经典诠释思想，不可避免地要运用比较的方法，即要把朱子放在中国传统的经学诠释历史中，既和他前时代的思想家比较，又和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比较，从中发现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同时还要把朱子的经典诠释思想和西方的诠释思想作一比较。但在诠释学的研究方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还需要向西方借鉴一些成熟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以发现在西方

文化的背景之下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的独特性。

在和西方诠释学的比较中，需要注意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朱子的经典诠释思想是不是可以和西方的诠释学作平行的比较研究，如果不能作平行的比较研究，那么能够作比较的是哪些部分；二是在比较中无论从思想还是从方法来看，都有同有异，重要的是重视相异的方面，因为完全用西方诠释理论解释中国文化是不妥的，西方的解释理论不是对所有文化形式都有效，它并不是一种普适的解释理论，否则就没有创建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必要，之所以重视中西诠释学方法中的差异，是因为只有差异部分才是朱子经典诠释学的特质所在。

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就有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诠释，中世纪也有对《圣经》的大量解释。就是说，西方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但此时尚不能说西方已有了完整意义上的诠释学。直到19世纪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才真正把“解释问题”作为一门理论来研究，而在此之前的所有诠释活动，只能是一种“前诠释学”的形式。在中国，一部经学史，即是对经典诠释的历史，发达的经学和由此衍生的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校勘辑佚、典章目录等学术，并未能生发出一门有关一般理解的诠释学理论，中国古代学术始终笼罩在经学的氛围之中，中国的“诠释”学问，始终围绕着经典展开。从孔子编纂六经，到清末经学的解体，诠释与经学的必然联系才告终结。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注经方法的不断延伸与积累，而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诠释学。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经学即中国特质的诠释学，但这里的诠释学概念只是对西方诠释学指称的借用，不是学科意义上的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已经历过两次革命性的变革，即利科所说的“从局部诠释学到一般诠释学”和“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两度转变。第一是逐步扩大诠释学的目标，使得各种局部诠释学汇合成一门一般的诠释学，与此同时，诠释学也发生着“基本性方向的演变”，即由方法论问题逐渐地向本体论问题演变。施莱尔马赫完成了诠释学的第一次转变，他将一般性解释的课题从对各种不同文本的个别诠释活动中分离出来，把诠释学提高到一门“技艺学”的水平。施莱尔马赫给诠释学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诠释学不再局限于神学范围，甚至不再局限于语

文学或文献，而是引入了理解者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变成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心灵交通，“理解”本身成为一般的原则与学问。狄尔泰继承了这一方向，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技艺的内涵，把解释的对象不断地从文字形式、从文本的意义和指谓转到文本中所表达的生活经验上，展现出“理解”和“解释”所包含的更为深刻的含义，使诠释学进一步成为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诠释学从海德格尔开始了本体论转向，诠释学不再是言表的技巧和方法，甚至不再是对精神科学的思考，而是对精神科学赖以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随着诠释学的哲学转向，文本解释的问题越来越不重要，狄尔泰之后，“一般诠释学”走向通往哲学思辨的新路。

当代西方诠释学大致包括作为方法的诠释学，作为哲学的诠释学和作为批判的诠释学三类。另一种划分是把西方诠释学划分为“前诠释学”（《圣经》释义学和古典语文学）、一般诠释学（施莱尔马赫）、体验诠释学（狄尔泰）、此在诠释学（海德格尔）、语言诠释学（伽达默尔）以及现代批判诠释学。^①

显然，中国的经典“诠释”观念与系统，以及有关诠释问题的传统资源，大体只能划归到“前诠释学”的形态之中。因此，对应这几个不同阶段来思考“中国诠释学”，可以看到，对于西方的“前诠释学”，我们可以作平行的比较研究，既可以用西方的诠释理论、观念和行为来评价中国的诠释传统，又可以用中国的诠释理念和实践来评点西方诠释学。因为从诠释问题的观念背景和展开方式来讲，两者的确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对于施莱尔马赫摆脱了注经学的个别性而上升为一般系统的普遍诠释学，在中国并不存在。虽然作为理论形态的诠释学中国不存在，但西方一般诠释学的有关理论、思想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都有所表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也有某种一般的、普遍的、规律性的原则，因而可参照西方一般诠释学的模式和框架，从中国的注经传统中梳理出一个一般的诠释系统。对于体验诠释学来说，朱子的经典诠释方法中也有类似的心理体验，可以作部分的比较。而对于当代的哲学诠释学来说，中国的传统诠释资源与之相去甚远，难以作比较，所以我们对它可

^① 参见潘德荣《诠释学导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

能主要是借鉴和吸收的问题。当然，在进行中西诠释学的比较研究时，其目的不在于对西学的印证或认同，不能把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看作是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翻版，而在于换一个角度去更好地洞见中国经典诠释的丰富内涵。当然，在梳理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有关资料时，也不能有一种自大的心理，认为西方有的东西我们也有，不能硬生生地整理出一套东西和西方的诠释学理论、观点相比附，这实际上是一种隐晦的自卑心理。

四

研究朱子的经典诠释思想，重点在于如何在西方诠释学语境下凸显出中国自己特有的诠释思想。经典的普遍性并不在于它的永恒不变，而在于它的不断翻新，它永远是活生生的。经典作为一种文本，都只是一种材料，都要不断地获释，时间越长，诠释空间越大。由于中国和西方的诠释学是在不同的基础上对不同的文本的理解，因此在同一普遍的理论原则之后，存在着一种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的深刻差异。中国尽管有悠久的经典诠释的传统和诠释经验，但它形成的理论形态是中国的经学、训诂学和注释学等。中国虽然从来没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的诠释学，但有自己丰富的经典诠释传统和经验。如何在挖掘、整理这种诠释传统与经验的基础上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诠释学，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就学科建设而言，中国的学术要与国际接轨，没有西方的知识系统作为参照是不行的，但学术接轨是互相的，中国要同西方接轨，西方也要同中国接轨，否则就谈不上平等的学术对话。但当前经典诠释的尴尬之处在于，关于中国经典的诠释，往往是西方诠释学术语和概念的“天下”。当然，这是中国学术和世界接轨、通向全球文明进程中不可省略的一步，因为中国经典诠释学在取得现代意义与表达形式的努力中，已无法不使用西方的语言。但为了对经典赋予新的意义诠释，在“求同”的过程中，不能忽略差异的存在，要注意中国传统经典中的每个重要概念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性与独特性，因此要注意维持其自身概念的特殊性，从而寻找中西学术会通的真正可能性。

朱子一生著作众多，涉及经、史、子、集等各个领域，其思想博大精深，后世研究朱子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多是从其理学角度进行研